

復漢之舊？—— 清代《左傳》學對杜預學的接受與衝突

宋惠如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清代《春秋》學反宋明空疏之風，先取《左傳》以為據，次溯傳注之源，從漢代經學中尋求古義古注，以建立有本之學。當清儒採《左傳》以為釋經根本，便不能不參考杜預《春秋》學，而深受其影響。杜預學雖承漢儒經說，在其〈春秋序〉所主張的解經觀念與方法上卻大異於漢儒。清代學者從搜羅漢代古經古說，逐漸深入、擴大至解經理論與方法，終觸及與杜預學相違的觀念方法，而有所抉擇。本文說明清代《左傳》學在重建以漢儒經說系統的歷程中，學者所面對與杜預《春秋》學主張在解經方法上的融合、接受，衝突及其影響。

關鍵詞：清代《左傳》學 《春秋》觀 解經方法 杜預

復漢之舊？—— 清代《左傳》學對杜預學的接受與衝突

宋惠如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乾嘉以後，清代經學走向以漢代學術爲主的思潮，各項經典研究莫不以回復漢代古經古注爲主要取向，《左傳》學也在這樣的學風下，取得豐富成果。現代學者研究清代《左傳》學，便是以專家研究爲基礎，論述清代《左傳》學之內容與成就，歸結劉文淇父子《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爲清代漢學在《春秋》學上的總成就，推崇清代《左傳》學在復漢舊注上的成果，呼應當代漢學思潮。^①

① 近二十年對清代《左傳》學的研究相當多，兩岸三地出版論文專書多達三十本，期刊四十餘篇。也由於《左傳》學專家研究之成果豐碩，至今總論清代《左傳》學多達有四本專門著作。2007年臺灣學者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首出，2008年大陸學者劉宗棠《清代左傳文獻研究》之博士論文、2009年金永健《清代左傳考證研究》博士論文、2010年羅軍鳳《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以清代《左傳》學爲專題的研究相繼出現。基本上皆以專家研究爲基礎，論述清代《左傳》學之內容、成就與發展。

後二部書尤說明清代《左傳》學發展的特質；張氏《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論述著重《左傳》學者對於當代漢學思潮的回應，注意到清代《左傳》學注疏形式上的轉變，以漢儒古注作爲清代創新《左》學資源上的挹注，與釋經之尚禮特質。羅氏《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則在重視清代學術重視訓詁義理特質下，說明乾嘉漢學時期豐富的研究議題，嘉道時期今文學刺激下《左傳》學演變，晚清時期《左傳》學的突破，觀察每一時期《左傳》學發展的轉變因素、治學特質與成就。這二部書從不同層面注意到當代學風對《左傳》學的影響及其重要成果，同樣注重清儒對杜預學的補正與糾舉，並以此爲主要立場，以清

學者都注意到，從《左傳》學的發展來看，清代學者是在不滿宋明無本空疏之說解釋《春秋》、不滿杜預《春秋左傳》學經傳注疏錯失的基礎上，展開對漢代經學的回復。然而杜預在早期其實甚受推崇，又有其客觀因素。

歷來詮釋《春秋》有二大主軸，一則以史，一則以義，前者之據，非《左傳》莫屬，後者則在清初學者反對《公》、《穀》二傳之褒貶予奪、深文周納下，仍主張以切實有據的《左傳》史事，作為《春秋》學的釋義基礎，如萬斯大之謂：「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相同異，生今論古，事難懸斷，《左氏》詳核，宜奉為主。」^②姚際恆（1647-？）指出，《公羊》、《穀梁》的紕繆，人人皆知，而《左傳》之誣罔，難以懸知，世人因而「敢于闢《公》、《穀》，不敢於闢《左氏》」^③。因此，清初學者多主張以《左傳》詳核可見的史實，無論在《春秋》之史、《春秋》之義上，或正或反，皆以《左傳》為立論根據。由此可見，清初學者不滿前儒，欲透過《左傳》以為根據，重理《春秋》學的新學氣息。

杜預《春秋左傳》學乃魏晉以來取代漢儒經說根本且至要的參考，當清代早期學者抉擇《左傳》做為詮釋《春秋》的主要根據時，不能不參考杜預《春秋》學的成果，以為徵實的起點與基礎。往後，學者不滿杜預學，在別無所徵的情況下，又上溯漢代，以為徵實之資，更推其為詮釋《春秋》學之範式，透過重建漢儒《春秋左傳》學釋經體系，其嘗試反轉杜預《春秋》學論述，流變歷程經有清一代，又可見杜預學影響深遠。^④

代《左傳》學乃在對杜預學不滿與駁斥下所建立的新學。其實，不僅這二部書將清代《左傳》學的發展建立在對杜預學的不滿上，大部分研究清代《左傳》學專家專書的期刊論文，亦多注意清儒反對杜注孔疏的論述上，順此而推清代《左傳》學的總成績在破舊注、作新疏，有著一致的結論，而對清代《左傳》學的相關論述，重心多在回歸漢學這一層面。

② 據萬斯大友人引述之言。見清·鄭梁：〈跋翁傳〉，《五丁集》，《寒山詩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2，頁25。

③ 清·姚際恆：〈春秋論旨〉，《春秋通論》，《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春秋類139，頁6。

④ 說明清代《左傳》學如何受杜預學影響的文章甚少，僅劉家和先生曾具體指出，清儒對杜預傳注、釋例實有取有捨，又在取捨中提昇清代《左傳》學，可見清儒對杜預學的繼承與發揚。

尤其，漢代經說十不存一，經二、三百年對《春秋》與三傳的經解與方法的反思，清代《左傳》學的發展與成就不單只是漢代經學的複製與再現，而自有其格局與主要議題。然而漢代學術與杜預學《春秋》學理論觀念與解經方法上的衝突如何？清儒如何抉擇，困境是什麼？本文透過這個議題的分疏，說明清代《左傳》學不同於漢代《春秋》學的觀念與方法，主要從一、素王改制說，二、以例釋經二層，進一步了解清代《左傳》學的具體內涵、發展與轉折。在此之前，必須先了解漢儒與杜預學的根本差異。

杜預學之異於漢儒《春秋》學的根本因素之一，在於杜預反對漢儒以孔子為素王、《春秋》為改制之法的主張上。孔子為素王、《春秋》為素王改制之法，在董仲舒始成連結。董仲舒推《春秋》為群經之首，將孔子與《春秋》的關係發揮到極致，視《春秋》為孔子意旨之所存，其謂：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⑤

所先正王，乃行天子之事。孔子先正王，無天子之名而行其實，故稱之為素王。《春秋》之作即為素王之文。^⑥由《春秋》之作，可得見國家政事存在著條貫規則，為孔子經世之法，也可以說，將經世意旨繫之於萬事，見之於《春秋》。因

（氏撰：〈從清儒的臧否中看《左傳》杜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1年），頁42、43。）

⑤ 漢·班固：《董仲舒傳》第26，《新校本漢書》卷56（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頁2509。

⑥ 據程元敏分析素王說的由來，在《淮南子主術》中有謂：「孔子專行教道，以成素王。」始明以素王屬孔子：「教道」，通指六經之教，故淮南王尚未以孔子作《春秋》為唯一受尊的素王之文。董仲舒對武帝策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為始倡孔子作《春秋》，為素王之文。（氏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87、88）其次，見《說苑·貴德》「孔子……退作《春秋》，明道王之道之示後人」；西漢哀、平之際讖緯書，亦多言《春秋》為孔子制素王之法。素王制法，意謂改制舊文，作新法。《公羊》家更具體指出，孔子「黜周王魯」，廢黜周王，以魯為新王，「以《春秋》當新王」，視為孔子改制新法之作。

此，董仲舒獨尊儒術，推崇孔子，將《春秋》視為孔子經世意旨之所存。其次，董仲舒將《春秋》視為政治改革依據，提出「改制」之說^⑦，認為改制是王者正前代之不正的方法，《春秋》即為孔子的改制之書，所謂孔子當素王，《春秋》為素王改制之文，於焉成立。後來，董仲舒的說法，不僅成為《公羊》學之基本觀點，也為當代《左傳》學者所尊奉，而為漢儒的共識。^⑧

至東晉，杜預學起，他反對素王改制說。據《論語·子罕》載，當孔子疾甚，子路欲尊榮孔子，故使門人假家臣治喪事，行大夫葬禮，孔子稍癒，即斥責子路不應僭禮，並明平生不欺之意，杜預認為，自號為素王，為僭禮欺天之大者，孔子必然不為。同篇又載孔子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感傷時王之政，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指禮樂制度。杜預認為，孔子有繼文王之文之志，周平王為東周之始王，魯隱公為讓國之賢君，《春秋》之所以自魯隱公開始記述，是因為平王和隱公皆周公祚胤，皆處時代交接、治亂更迭的臨界點上，若平王可紹開中興，隱公可弘宣祖業，光啓王室，那麼西周文、武之跡則可立於不墜，因而《春秋》乃附隱公以來之行事，采用周之遺法，制義於其中，垂法將來。簡言之，杜預認為，《春秋》之制作，是孔子對東周禮崩樂壞朝政的指正，也是有待於未來的一種抒發。因此，他不僅反對素王立法之說，也反對公羊家「黜周王魯」的激烈立場。

比對杜預之不同於漢儒，其實來自於杜預對孔子修魯史、繼承周文這一說法的強調。漢儒認為孔子修魯史成《春秋》，所謂據魯史作《春秋》，並不能簡單的視為是史文的承襲，而主張《春秋》所記就是孔子之法。杜預則重視《春秋》的內容錄自魯史這個層面的意義，強調對前代史觀與禮制的傳承、延續，將漢儒以孔子作新法說，轉移到關注魯史中所具有的周制禮文對修作《春秋》的影響上，

⑦ 徐復觀指出，若從損益的觀點談改制，可溯自孔子。但是改制之說的提出，不見於三傳，董仲舒是最早提出這個說法的。參氏撰：《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卷二，頁345-350。

⑧ 東漢《左傳》學者賈逵、桓譚皆推闡董仲舒說，如《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序》引賈逵說：「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是古文家亦同意素王說之證，益知董氏的《春秋》觀，為漢代通說。

亦由此建構一套不同於漢儒的觀點來看《春秋》。他對歷史傳承的重視，主張《春秋》延續周代禮文的觀點，後來成為代表《左傳》學的主要見解。⁹

對《春秋》成書、孔子與《春秋》理解的不同，由之而來在解經方法上，漢儒與杜預也有很大差異。漢儒主要認為《春秋》經文記述同一類的事件時，書法若有相異，即表示當中有孔子之意，而將經文書法視為具有通則效用的寫作，也就是「例」，以經文一字之變化，寓有孔子書法與深意，漢代《春秋》學多有名為「條例」著作，可見以例解經為漢儒詮釋經義的重要方法。¹⁰

杜預將漢儒提列書法條例以明孔子義理的詮釋方式，視為所謂的「一字褒貶」說。¹¹他並不完全反對漢儒「一字褒貶」之說，只是認為經文記述有異，不代表當中必有含意；有沒有寓意，必須依傳文為斷，不可妄自臆說。換言之，經文有例與無例，當據傳以立說。因此，杜預多不同意漢儒之說例，批評漢儒「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不僅不同意《公羊》、《穀梁》說，又指漢儒之《左傳》說例乃轉相祖述，既非錯綜經文之變而來，也不是根據傳文以釋經，實無可靠根據以為其說。他主張《春秋》幾乎承自魯史，是以在詮釋《春秋》時常以史文敘述釋之，不認為有特殊書法與意義，質疑漢儒家說師法

⁹ 如廖平〈今古學考〉在說明古文經學，即以《左傳》尊奉「周禮」，尊周公為其特點。皮錫瑞同樣認為，杜預說出，遂分為周公之《春秋》，孔子之《春秋》（《經學通論·春秋·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為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3）。周予同整齊表列今古文經學異同，也將杜預說作為古文經學的代表，以古文經學崇奉周公，視孔子為史學家，將杜預對傳承周禮的強調，視為《左傳》學重史，且貶抑孔子的表現。（氏撰：《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9。）

¹⁰ 《公羊傳》關於條例著作的著錄，最早見於《隋書·經籍志》，有何休《春秋公羊傳條例》及《春秋公羊詁例》。《左傳》更多，見《隋書·經籍志》錄有漢穎容撰《春秋釋例》十卷。（唐·魏徵：《新校本隋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年。）又《舊唐書·經籍志》錄有劉歆《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鄭眾撰《春秋左氏傳條例章句》九卷。（後晉·劉昫：《新校本舊唐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年。）《新唐書·藝文志》錄有鄭眾《牒例章句》九卷、穎容《釋例》七卷。（宋·歐陽修、宋祁：《新校本舊唐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年。）

¹¹ 晉·杜預：《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序》，頁15。下引同。

的可靠性，尤其表現在《春秋》「闕文」的判定，與認為經文「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¹²的解經方式上。

漢儒與杜預學的重大歧異，在清前期學者未窺漢儒《春秋》學概貌時，不見其衝突，特別是此時學者參考杜預學多，對其主張孔子《春秋》承自魯史與解經方法，常從習之。

二、早期對杜預學的依從

清初學者推崇《左傳》詳密記事，可供考校參詳，表現對文獻與史實的重視，是以當時《春秋》學有重史一派，特別突出《左傳》歷史敘述與記事的條理，其中為學者所熟知者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顧氏重新校理《春秋》史事，不滿三傳之解經，認為《春秋》因傳而明，亦以傳而晦，指《左傳》「好以兩事合作一事，生出牽扭」¹³，在〈春秋三傳異同表〉中，批評「《公》、《穀》之妄不待言」¹⁴，以《公》、《穀》生於漢時，「據所傳聞，謬誤尤甚」¹⁵。他主張經傳互異者，當捨傳求經¹⁶；所謂捨傳求經，基本觀點乃在「《經》文本直捷簡易，不知傳者何苦自生支離，《左氏》以為善，《公》、《穀》以為諱，俱謬。」認為當「推見至隱，原情定罪」。¹⁷

顧棟高突出史事、羅列史實，作為直接詮釋《春秋》的根據，其不滿三傳，主張推見至隱、原情定罪，又有承於宋明儒捨傳求經、直探孔子《春秋》之途。再者，他徵以史實以釋《春秋》，其釋經取向與《春秋》學觀皆不脫杜預學。雖作有〈春秋杜注正訛表〉，批評杜預論禮、地理、時日、稱名、解經傳等等傳注失誤，卻是認同杜預之反對具漢儒讖緯色彩的「絕筆獲麟」說，質實的主張《春

¹² 同前註，頁 13。

¹³ 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三）（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2262。

¹⁴ 同前註，頁 2337。

¹⁵ 同前註，頁 2477。

¹⁶ 同前註，頁 2479。

¹⁷ 同前註，頁 2295、2601。

秋》絕筆乃因當時請討陳恆之不行¹⁸，接受杜預「史承赴告」說，立場相當鮮明。

清初不僅重史派繼承杜預《春秋》學主張，即如顧炎武（1613-1682）開以古說補正杜說風氣者，雖糾補杜預傳注之失，卻不代表其《春秋》學是站在與杜預對立立場，相反的，他相當推崇杜預《春秋》說，基本見解多和杜預一致。

顧炎武相當重視《春秋》承周禮、魯史而作的意義，於《日知錄》論《春秋》之卷，首先捻出「魯之春秋」之目，指晉韓宣子觀書太史氏見「易象」、「魯春秋」之謂：「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以「魯春秋」承周禮，並溯其源的測度魯史當起於伯禽之封，以洎中世，周之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是謂「周禮」，並提出以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者」的主張。¹⁹這樣的主張，其實是架構在杜預《春秋》承魯史周法的論述上。更由於顧炎武信從杜預的《春秋》學觀點，所以在不同層面上多補充杜預說，如釋「諸侯在喪稱子」一則，述說書法之所成因由，有謂「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²⁰

甚而，閻若璩（1636-1704）評議顧炎武說法時全據杜預說，有謂：「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事，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²¹認為杜預之說，理所當然，又指顧炎武多所贅言，可見閻氏完全接受杜預《春秋》學觀點。由此可知清初學者以杜預《春秋》學主張為基礎，以《春秋》錄自魯史，具有周制、史書筆法之論，為其詮釋《春秋》學的基本立場。也因此，清初學者在傳釋注疏上或有糾杜、正杜之舉，在《春秋》學主張上卻是從杜而尊杜。

在解經方法上，清初學者有承於宋儒普遍不信三傳說例的主張，顧棟高便認為「看《春秋》須先破除一例字。」²²指出：「孔子嘗自言曰辭達而已矣，若《春秋》之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及曹、宋之大夫不書名，不達已甚，顯係闕斷。宋

¹⁸ 同前註，頁 2438。

¹⁹ 清·顧炎武，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79。

²⁰ 同前註，頁 225。

²¹ 同前註，頁 180。

²² 清·顧棟高：〈讀春秋偶筆〉，《春秋大事表》（一），頁 42。

儒不察，皆目爲意義所存。」²³主張「闕文」不具意義，反對「一字褒貶」說，²⁴顯見其不信書法義例說的立場。

顧炎武既主《春秋》承舊史，也認爲經義多直書自見。在「謂一爲元」一則同意《五代史·漢本紀論》之謂：「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²⁵在《左傳杜解補正》中，多謂「古之常例」、「史之舊文」、「史氏之體也」，皆可見顧炎武接受杜預以《春秋》從魯史舊文，不以爲孔子例的說法。

如釋「仲子」一則，論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謂：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公」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²⁶

對於《春秋》異文，不以爲是《春秋》書法義例之所在，所稱「承上文而略其辭」，乃是從行文語氣的角度說明經文之參差、異文。又如釋「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桓公八年事，批評《公羊》說曰：「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反對《公羊》之以書法義例的說經方式。²⁷

同樣的，他看待《春秋》闕文，指孔子曾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而云：

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²⁸

²³ 同前註，《春秋大事表》（三），頁2438。

²⁴ 同前註，〈春秋俱係孔子修成以後闕誤論〉，《春秋大事表》（三），頁2476。

²⁵ 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頁193。

²⁶ 同前註，頁198。

²⁷ 同前註，頁264。

²⁸ 同前註，頁181。

批評前代學者對《春秋》學的增益附說，認為《春秋》闕文，當出於無徵不信、不妄加推測的保留原貌。

毛奇齡（1019-1068）既不滿胡《傳》、《公羊》、《穀梁》之釋經，亦不認同漢代賈逵、服虔論《春秋》命名與端門受命說，以其多牽摭今文說，主張當從杜注孔疏之據《左傳》立說的學者，有其鮮明的立場與主張。他也不滿歷來義例說，認為：

但《春秋》義例不一，無一是處，大抵此白彼墨，前三後四，必不能畫一，而前人相傳科指，又極其龐蹟。……于是周章蔑略，了無定準，而《春秋》亡矣。²⁹

指出義例說眾說紛紜的困難。又提出：

若孔《疏》所云，稱凡五十，其別四十有九，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則專指《左氏》所據典禮，與杜氏所釋之數為言，並非通例。其餘年時月日，與國氏人名天王天子種種陋義，則此言註《春秋》者，已痛辟之，以為一爻可錯諸卦，一字不能成一義，晉唐以後，早已不屑置喙者。³⁰

所顯示觀點有二層，一、他信從杜預對漢儒一字褒貶說的批評，二、即使是杜預釋《左傳》五十凡說，亦只是杜預、《左傳》一家之說，並不為《春秋》通例。由此可見，毛氏不僅不信漢儒說、宋儒說、《公》、《穀》二傳說，也不全然相信《左傳》說與杜預說，而主張直探孔子《春秋》之義，尚有宋明《春秋》學之遺風。

因此，清儒雖然也認為書法義例是詮釋《春秋》的重要途徑，但對三傳及其注

²⁹ 清·毛奇齡：《毛氏春秋傳·總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年影《皇清經解》庚申補刊本），卷120，頁8、9。

³⁰ 同前註，頁8。

疏詮釋書法義例多有存疑，他們不滿三傳、宋儒之以例釋經，姚際恆作《春秋無例詳考》，顯見當時學者之不以例說經為然。當中最大問題其實就在無從建立一致、有據的釋例標準。從學術發展來看，清初尚未累積漢儒釋經傳注系統，沒有可信根據成其釋例準則，使其對傳統釋例之說，多反對之、另創之，甚至捨例不談。

三、追溯漢儒《春秋》觀

既然歷來的書法義例說不可信，清早期學者有意識的建立有本之學以抗空疏之風，那麼所謂建立有本有據的方式是什麼呢？除據史以說經外，便是據禮以說經。清儒在據禮說經這一個方法上遭遇的首要問題，便是禮文典據的探求。

毛奇齡不滿《公》、《穀》二傳之釋《春秋》，但在舉周禮明《春秋》書法說義，抉擇周禮典據時，除參合《周禮》、《左傳》之外，因周秦典籍有限，不免還是要參考《公》、《穀》二傳，是以毛氏自謂：

夫不以《公》、《穀》解《春秋》，吾之言也。豈自言而自悖之？然凡解經者，當以經解經，此又吾之言也。吾仍以經解經耳。策書缺，不全矣。《穀梁》雖道聽，不見策書，然亦必有道路相傳，十得一、二者。³¹

認為解經當用本證，以經解經為其上者，因此他雖然不滿二傳，但二傳相傳自周秦，經說當有十得一、二者。換言之，據禮說經以「以經解經」為根本途徑，那麼廣搜周秦古經是首要，參考近於周秦的漢儒古注便是其次的選擇了。

惠士奇（1671-1741）作《半農春秋說》，深研《春秋》之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其：

士奇父周惕長于說經，力追漢儒之學，士奇承其家學，考證益密，於《三禮》核辨尤精，是書以禮為綱，而緯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

³¹ 清·毛奇齡：《經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年影《皇清經解》庚申補刊本）卷166，頁3。

傳》附於下，亦間以《史記》諸書佐之。大抵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採《公》、《穀》。³²

以惠氏因《公》、《穀》二家辨禮明義者甚多，據典釋禮多以二傳為斷，可見二傳作為清儒考釋古禮典據來源的重要性。

因此，清初《春秋》學據史、考史之法蔚為風尚，在解經理論與方法上多遵從杜預，同時據禮以釋經也前有所承的加以發展，使得尋求本據所參佐的典籍也從《左傳》與杜預學，擴大到周秦經典與漢儒釋說。

章太炎和劉師培推舉清代漢學之首為臧琳（1650-1741），以其「樹漢學以為幟，陳義淵雅。」³³臧氏主張治經必以漢注唐疏為主，有謂：「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授以後儒之傳注。」³⁴以復周秦古說、經傳原始面貌為目的，呈現出清代早期在詮釋經傳時，根據不足與檢別理據上的困難，是以此時《春秋》學在追求本據的目的下，復漢說不分古文學、今文學，三傳互以為據。

至惠棟治《左傳》，進一步在崇奉漢儒經解的立場下，不僅反對杜注，也異於前儒從習杜預《春秋》學主張。他雖然接受其父惠士奇「周禮盡在魯矣」的看法，卻不怎麼強調《春秋》秉魯史周法，具史例書法、直文見義這一層釋義，而多注重孔子微言大義，而從今文學立場釋《春秋》之義。

他在《九經古義》中評《穀梁》則從鄭玄《六藝論》說：「《穀梁》善於經」，述《公羊》時又多遙錄漢儒《公羊春秋》學之說，指出：

³² 清·永瑤、紀昀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62。

³³ 章太炎作《春秋左傳讀》即是以文字、聲韻、訓詁等小學考證方法，深取兩漢經訓，考究經義，他自述此書之作：「初名《雜記》，以所見輒錄，不隨經文編次，效臧氏《經義雜記》而為之也。」（《春秋左傳讀敘錄·序》，《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808。）而見其推崇臧琳漢學之意。劉師培語見〈清儒得失論〉，李妙根編：《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頁144。

³⁴ 徐世昌：〈玉林學案〉上，《清儒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79年）第二冊，卷44，頁1。臧琳《經義雜記》，共四百五十餘條，關於三傳者一百三十餘條。其中論《左傳》又佔一百二十餘條，多以漢注補杜、正杜注。臧氏廣泛比對五經、《史記》、《漢書》，以及漢儒說同名異實、異名同實之說，搜取漢儒舊注，以《公》、《穀》訂正杜預說。

- 一、康成《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
- 二、《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製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
- 三、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筮（案：當為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³⁵

他首先說明《公羊》學之傳承，劉向亦從習之，其次以孔子端門受命說述說《春秋》作意，在第二、三條中又可見，惠棟以《春秋》乃觀書於「周史」、採「百二十國寶書」而成，這兩個說法都是今文學的主張。其中，端門受命說不為杜預所認同，清初諸儒亦反對此說，對《春秋》成書也大不同於杜預、清初諸儒以為錄自「魯史」的說法。

雖然惠棟《九經古義》旨在搜羅古注，所侈錄者不見得是其主張，但他信從漢說，在《左傳》古義中又不見其侈錄漢代古文學者之《春秋》觀，顯然在《春秋》學的思維異於杜預學，在其推崇漢學，兼採今、古之中，又傾向今文學。³⁶

《提要》評惠棟尊漢論述與釋經為「泥古」，論及《春秋》學，不僅推崇《左傳》，也以杜預學為《左》學門徑，顯然不僅不滿惠棟《春秋》學採漢儒說，也

³⁵ 清·惠棟：《九經古義·公羊上》，《皇清經解》卷371，頁1、2。

³⁶ 楊向奎在《三惠學案》指出，惠棟專精《易》學，雖標榜以古字易俗字，乃古文易體系，但說《易》卻是採取今文學派的學說，多陰陽災異之學，又企圖溝通《易》與《春秋》。他認為惠氏：「以《易》是「天學」，宇宙萬物之成長，實與《易》之成長相因，乃二而一者。而《春秋》紀事，效法《易經》，以人事結合天道，所以他說「《易》與《春秋》，天之道也。」可見惠棟學術之治學，有其復古經古注之要求，在方法上傾向東漢訓詁考據之法，釋經上從鄭玄綜兼今、古文學，經學思維則推崇漢代天人、陰陽思想，近於今文學。（氏撰：《清儒學案新編》，濟南市：齊魯書社，1985年，頁117、118。）

不認同其今古兼採的《春秋》學走向。事實上，惠氏之後的《左傳》學者，雖仍尊漢、存漢古說，但在搜集經注傳釋、《春秋》學觀與解經方式上，又不同於惠棟兼採古今。

洪亮吉（1746-1809）批評杜注，徵引古訓舊說，以「訓詁以賈、許、鄭、服為主」³⁷，有意識的專取東漢《左傳》學說。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亦以賈、服說為主，參照杜說，專就漢儒舊注，疏通證明。此時學者對漢儒經說更為信從，相對的杜預批評愈趨嚴厲。

劉文淇、劉毓崧（1818-1867）父子的《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後稱《舊注疏證》）也繼承這樣的立場，曾說：

竊歎《左氏》之義，為杜征南剝蝕已久。……覆勘杜注，真覺痼疾橫生，其稍可觀覽者，皆是賈、服舊說。³⁸

取釋偏向漢儒經說。此外，劉文淇更將漢儒舊說的搜求與認定，擴大到「《周禮》、《禮記》疏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大異者，亦是賈、服舊說。」認為韋昭《國語》注中，「除自出己意者，餘皆賈、服鄭君舊說」，廣泛的搜求東漢經說，由此建立以東漢經說為主的新疏，取代杜《注》孔《疏》。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疏通證明古經古注時，當如何理解《春秋》的成書與性質，以為其《春秋》學主張？

此際《左傳》學者之《春秋》觀，又不同於惠棟之從《公羊》今文說，而採賈逵《春秋序》的說法。李貽德《輯述》開篇引賈逵說《春秋》制名之由：

賈曰：「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

³⁷ 清·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2。又謂「余少從師受《春秋左氏傳》，即覺杜元凱于訓詁、地理之學殊疎。及長，博覽漢儒說經諸書，而益覺元凱之注，其望文生義，不臻古訓者，十居五六。」（同前）

³⁸ 清·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附錄1，頁1。下引同。

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³⁹

繼而據《爾雅·釋詁》、《周禮·冢宰》、《漢書·律歷志》證明《春秋》取法陰陽說之有據，紹承於劉歆。

他說明「周禮盡在魯矣」時說：

昭二年傳文，史法最備，謂未脩之「春秋」。如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孔氏謂五十凡是周公舊制，是史法最備也。⁴⁰

不僅引申賈逵「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說，又藉孔穎達說法，以《左傳》五十凡是周公舊制，故史法最備為釋。當中，賈逵《春秋》說事實上只談到魯承周禮、史法最備而已。李貽德尋繹賈逵《春秋》觀點時，事實上仍援以杜注孔疏之說。

至臧壽恭（1788-1846）作《春秋左氏古義》，方得脫去杜注孔疏之說，專主東漢《春秋》觀。臧氏引《春秋正義》述賈逵〈春秋序〉謂「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再引《春秋正義》云：

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為書來，應言麟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漢魏諸儒，皆為此說。⁴¹

基本上信從致書獲麟說，接受孔子為素王，《春秋》乃立素王之法的論述，此為漢代《春秋》學的共識，而與杜預有違。

³⁹ 清·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輯述一》，《皇清經解》卷 757，頁 1。

⁴⁰ 同前註，頁 1、2。

⁴¹ 清·臧壽恭：《春秋左氏古義一》，《皇清經解續編》卷 579，頁 1。下引同此。

透過整理《漢書》、《春秋正義》之說，臧氏略述東漢學者之治學梗概，繼之引《南齊書·陸澄傳》說明杜說與賈、服說流行之況：

永明元年，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杜、服《春秋》，澄與王儉書云：
「《左氏》宜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經》又無《傳》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⁴²

知賈氏經傳兼取，服氏注《傳》而注《經》，又知服氏於《傳》注中具引《經》文，顯示臧氏對東漢《左傳》學發展的關注。臧氏試圖進一步探究東漢《左傳》學各家的注說差異，可見在乾嘉學者逐步累積漢學古注經說的基礎上，又深入東漢《左傳》學之釋經系統。

在《春秋》成書與性質上，李貽德主張《春秋》承周禮，史法最備，傾向杜預說，臧壽恭則依從東漢儒說，視《春秋》孔子素王之法之所在，已見兩者異趣，其後，儀徵劉氏家族總結清代《左傳》學成果，在更為成熟的注疏條件上，重構《左傳》新疏，在新疏的基礎上，時代思潮的作用下，劉師培重新思考漢代《左傳》學的釋經根據與解經方法上的問題，建構漢儒的解經方法論。

四、以例釋經：漢儒解經方法的重構

劉師培繼其家學，除接續清代《左傳》學總路向，步步走向漢學復興之途外，在新疏的基礎上，一方面深入反省杜預主張的《春秋》、《左傳》內涵性質和解經方法，一方面提出漢儒解經的系統架構。

首先，劉師培認為周公制禮作樂固為周初盛事，然制度之施行，有因時、地、事而損益之況，即使周禮盛行於魯國，其施行必有異於周時之制，杜預以魯行周

⁴² 引與原文有出入：「《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由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2年，頁684。）黑體字與臧氏所引不同。

制，便謂《春秋》之法乃周公垂文，逕依史文中所載行事以見周文垂法之說，是有問題的。

他考察魯國實雜用夏商之制，不全然採行周制，可見魯史所記不只是周之行制，魯史舊文中的記錄不能直接代表周代禮文。⁴³因此《春秋》經傳之書法義例，不能如杜預所謂以史官書法即周公治法。即如孔《疏》也不同意杜預說法，劉氏說：

又杜氏《集解》自序云：「其發以言例，均經國之常制，周公所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孔氏《正義》云：「杜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案所謂先儒者，即東漢賈、服諸儒之說，蓋漢儒以《左傳》凡例多出丘明之意，與杜氏以凡例為周公舊法者不同。《正義》引此，蓋亦不以杜說為然。⁴⁴

據孔《疏》所言，東漢賈、服舊說以周公遺存的舊史書法是《左傳》作者之意，與杜預直接將以凡例視周公舊法之說，兩者是有分別的。

劉師培認為，杜預之所以一概將書法凡例視為周公垂法，乃因未區分國家治法與史官書法：

考《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鄭注云：「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乘以制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是禮經即周典。周典之例，國例也；《春秋》之例，史例也。史例與國例不同。若謂《左傳》凡例即周公所定之禮經，是混史例于國例之中也。⁴⁵

⁴³ 劉師培：〈論孔子無改制事〉，《劉申叔遺書》（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394。

⁴⁴ 同前註，〈讀左荀記〉，頁301。

⁴⁵ 同前註。

因為「禮經」即是指國家的禮法，也就是周代所行的治世之法，亦即「周典」，乃一國守常之法式。《春秋》書法則是載書歷史的特殊表達方式，是為「史例」。杜預將《左傳》解釋凡例，等同於周公所制的常典治世之法，便是混淆周公治世之法與史家書法。劉師培認為，杜預將《春秋》經傳表現意旨的特殊方式，亦即《春秋》書法和《左傳》凡例，和藉由書法凡例展現的經世之法兩者混同，而產生書法凡例即為周公遺文的含糊說法。

他主張《左傳》凡例乃左氏之言，並不能將之視為是周制遺文，更不能將《春秋》書法視為是周制遺文，而主張《春秋》乃出於孔子新構：

蓋魯秉周禮，恆侘史法以傳，孔子修經，冀昭周禮。……然條叢眾文，劉定摛損，上下比義，俾即櫟括，僉出孔裁，即非史舊志。稱褒諱貶不可書見，是博指約辭，以資口授，亦出孔經新構，所以明法將來，非魯史下符孔經，而孔經尚錄魯史也。⁴⁶

主要是說，魯固然秉承周禮，但魯史並不就是《春秋》。《春秋》有所褒貶、博指約辭者，乃是出於孔子重新構作，便不是魯史符合《春秋》，或《春秋》錄自魯史。換言之，他認為《春秋》內容有其獨立價值，縱使其中史法、書法有所承沿自魯史，但經孔子褒貶約辭，內涵性質便不同於魯史，當視為孔子新作。

劉師培批評杜預的史學傾向，認為杜氏解經不僅違背漢儒經說，更使後世《左傳》學發展走向歧途，有謂：

魏晉而下，穎、許說微。賈、服之書，迄唐而佚。六藝之儒服習杜說，入耳著心，化性成積，以為東魯策書，衰周之記注，致使素王之貴，下儕班馬，素臣之賢，夷于晏陸，下迄北宋，遂替《春秋》跡。其以史擬經，大慮蘊藩杜說。⁴⁷

⁴⁶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崇經篇第一》，頁323。

⁴⁷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頁335。

批評杜預以《春秋》為錄自魯史策書，為周法之遺的說法，將使孔子本為素王、制經世之法的價值，淪與馬、班同儕。

劉師培強調《春秋》的經典地位，更主張回歸到漢儒古文諸家治《左傳》的方式，便是以例解經，但漢儒經說在杜預五十凡之說出現後散失，是以劉師培認為：「杜說之誤，屬於訓詁典章者，其失小，屬於義例者，其失巨。」⁴⁸因此追索書法義例的解經方法，不僅說明《左傳》傳文標示的義例，也採用漢儒的《左傳》書法條例之說，認為：「漢儒創通條例，肇端子駿、賈、許諸君，執例詮經，于時月日書法三致意焉。」主張書法條例為漢儒詮釋《春秋》首出之法。

他提出六種類型的書法義例，架構漢儒書法條例的詮釋系統。首先就《春秋》闕文現象中，時月日記載詳略不一的現象，掇拾時月日古例為二十五例。在「名例」、「地例」中，對書名、書字，書地與不書地，以及對比經文與傳文敘述、經傳褒貶不一的現象，在「詞例」中說明經文用字，在「事例」中比對經傳詳略不一的記事，以及傳文指為「禮也」、「非禮」也的「禮例」，認為皆有其書法意含與價值判斷。劉師培以劉歆、賈逵、穎容說為依歸，認為：「劉、賈、許、穎銳精幽贊，以經為作，大體概同。二鄭、彭、服亦名家，經傳相明，咸主義例，詮經之要，莫尚於斯。」主張書法義例是詮釋《春秋》最重要方法，積極建構以義例為主軸的漢儒意義系統，以取代杜預以史事為主的釋經方式，糾正其強經就傳所致「以史礙經」之疑。

劉師培全面嚴正的批判杜預說，在《春秋》觀上，積極主張《春秋》乃出孔子新構，在釋經方式上，特別重視漢儒釋例系統，在經學意識上，有其強調《春秋》為經世常法，孔子微言寓意之所在之思維。換言之，在整體的經學思維上與詮釋系統上，至劉師培，幾乎回到漢儒的經學架構上，可說清代《左傳》學以漢儒為詮釋範式，從經注傳釋、解經理論到方法上的系統重建，至此完成。

但是清代《左傳》學至劉師培，在某種程度上，似乎系統的完成經注傳釋、解經理論與解經方法的漢學回歸之途，但在內裏上，實有其齟齬扞格之處，尤其在解經方法上，其先世劉文淇說例既不同意杜預，也不認同漢儒說，與劉師培推

⁴⁸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頁340，下引同。

崇東漢《左傳》學說的立場有相當的落差，此又實肇因於劉文淇深受杜預經史觀的影響，釋經根據與取徑不同所致。

五、「漢學」的侷限： 劉氏家族對杜預經史觀的接受與衝突

相較於劉師培著重以漢儒書法條例說做為詮釋《春秋》的主要方式和依據，以劉文淇為代表的《舊注疏證》則尋繹所謂的「周禮」做為其釋經根據，所承《春秋》學觀，與其說遙承東漢《左傳》學，不如說深受杜預經史觀影響。

劉文淇的尊漢立場與經傳注疏，基本上繼承乾嘉以來的《左傳》學走向，又有著更細緻深入的治經思維與發展。惠棟以來《春秋左傳》學者，皆主張兼採三傳，至劉文淇則力排二傳，原因乃其所謂：

若《公》、《穀》之作當戰國時，其所述事，未能盡確，則其義雖優，恐有郢書燕說之患。⁴⁹

信《左》在「文多可依據」，而二傳事無所據，述義也隨之無所根由，無從判斷二傳說經是否的當。換言之，二傳說經「無所本」，不符合徵實的方法與要求。他認為《春秋》有事、有文、有義，義雖為孔子所取，但必須「依文與事言之」，而認為《左氏》親見策書記事，故文多可依據，其事與文是否如實陳述，多有可按察的線索。由此可見，劉氏相當重視《左傳》史文一層，如清早期《左傳》學者，重視史文做為詮釋經傳的主要根據。

不僅如此，接續乾嘉以來復古經古字，重回東漢古說，劉氏父子作新疏，不僅在求真，且致力於求是，講究資料證據，欲以具體而深具說服力的方式擇斷經義，當中尤為劉氏注意的是周代禮文。

⁴⁹ 清·劉文淇：〈注例〉，《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下引同。

禮文所具備的價值與意義，為經典倫理綱常的顯影與投射，經典的義理性往往可從此得見，劉文淇詳述據「周禮」釋《春秋》之由：

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周禮」者，文王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周禮」明而後亂臣賊子乃始知懼。若不用「周禮」，而專用從殷，則亂臣賊子皆具曰多聖，而藉口於《春秋》之改制矣。⁵⁰

主張《春秋》必專據「周禮」，若有從「殷禮」，則《春秋》的理據就有多種標準，斷事將不知何據。專據「周禮」，使無《春秋》改制之藉口，一方面避免「多聖」下的多重標準，失去判斷根據，一方面也對《公羊》所倡的改制之文、從殷之質之說，有明顯的貶抑。他推崇《左傳》，貶抑二傳，所憑藉的正是「周禮」，試圖為判別三傳經說高下，尋求一致標準與具體根據。

劉文淇主張《春秋》取自魯史，非孔子改制之作，書法與義理前承「周禮」，顯然不同於惠棟的今文學，也不同於東漢《左傳》學者以孔子為改制素王的立場，而傾向於杜預之說。他意識到今文學與古文學在詮釋《春秋》學時，對「禮」的來源理解不同所造成觀念與理論上、也在解經方法上的影響。

對禮的儀文與義理的理解是《春秋》書法條例的重要基礎，劉文淇不認同杜預區分新例舊例，標舉傳文中的「凡例」，做為解釋《春秋》書法與經義的原則，甚至認為《左傳》五十凡例「乃周典中史例，不關周公創制」。⁵¹他贊同趙子常之說：

春秋之後，周典散失，左氏采合殘缺，傳以己意，略示凡例五十條，杜氏一定為周公所制，而不考其不通於經，則亦陋矣。

認為五十凡乃為《左氏》一家之學，而杜氏太信《左傳》例說，未能考其「不通於經」者，以至於陋誤。

⁵⁰ 同前註。

⁵¹ 同前註。

不僅批判杜預說例，他也不同意漢儒說例：

至若《左氏》之例，異於《公》、《穀》，賈、服間以《公》、《穀》之例釋《左傳》，是自開其罅隙，與人以可攻。⁵²

他了解到，《左傳》之例異於《公》、《穀》，成一家之說，賈、服卻持《公》、《穀》之例釋《左傳》，這部分是很有問題的。

劉文淇不認同漢儒和杜預的釋例，但是「例」作為漢代以來，三傳及各家注疏解釋《春秋》的重要方法，劉文淇無法迴避這方面的討論。他不滿意前儒例說，卻也無法掌握《春秋》書法規則，只表明《舊注疏證》之作：

文淇所為疏，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其《左氏》凡例，另為一表，皆以《左氏》之例釋《左氏》其不知者。概從闕如。

專釋訓詁名物典章，不提列條例之所在。

事實上，劉文淇曾就《左傳》凡例尋索「《左氏》其不知者」的《春秋》書法，欲另為一表，卻沒有完成。基本上，他認為五十凡只是《左氏》略示凡例，並沒有窮盡《春秋》書法，而視《左傳》為一家之言。由此看來，劉文淇其實不滿於漢儒《左傳》學的解經方法，視《左傳》凡例為一家言，不足以詮釋《春秋》，如此一來，不僅避免杜預學造成的強經就傳的問題，也維護了《春秋》之為經的超越地位。

回過頭來說，劉文淇不同意透過漢儒與杜預釋例，而主張專據「周禮」解釋《春秋》，所謂專據「周禮」究竟如何呢？如何可能？

首先，檢視清代學者所謂「周禮」，並非指《周禮》一書，乃泛稱之「周禮」，指的是周代制度儀文。如顧炎武謂：「一有良史，『周禮』才得以成，孔子繼史失其官，才作《春秋》」閻若璩《注》指出：「孔子《春秋》為尊周公之

⁵² 同前註。下引同。

舊典而無所變。」⁵³以「周禮」為「周公之舊典」。此說由來為《左傳》載昭公二年，韓宣子適魯，見觀「易象」與「魯春秋」，歎謂：「周禮盡在魯矣。」杜預據此而謂：「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將「禮經」視為「周禮」，為周之舊典禮經。

然而所謂的舊典禮經，是否是具體成書？杜預認為「禮經」是周公遺法，《左傳》當中所書五十凡，為周公史法，為《春秋》、《左傳》書法，令後人據此視「禮經」為周公所作。⁵⁴而且《周禮》一書，雖多有可疑，卻是可供考索周代儀文的專門籍典，傳為周公所作，因以為皆周公所作，「禮經」、「周禮」、《周禮》便混為一談。

當中，《周禮》雖傳為周公所作，宋元時便有學者主張《周禮》為劉歆偽作。《提要》為劉歆辯護，澄清《周禮》與周公，「周禮」的混亂。指出：

夫《周禮》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去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後世之法入之，其書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修，修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跡，遂靡所稽，統以為周公之舊耳。⁵⁵

試圖說明《周禮》作於周初，非一時一地一人所出，書經後世增刪，而統以為周公之舊，和周公並不見得有直接關係。

⁵³ 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四，頁180。

⁵⁴ 《左傳》隱公七年：「謂之禮經」，杜注云：「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第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眾記，始開凡例。」《正義》迴護杜說，亦謂：「杜言發凡五十，皆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別。（案：原文當為「例」）。」又云「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楊伯峻即持此說，見《春秋左傳注》（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書局，1993年），頁54。

⁵⁵ 清·永瑤、紀昀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05。下引同。

《提要》繼之謂：「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指出《左傳》所論「禮經」的內容，和《周禮》不相同，是以《周禮》並非《左傳》所謂「禮經」。

那麼「禮經」所指為何？《左傳》有所解釋。隱公七年傳文：

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據楊伯峻考釋，隱十一年傳云「怨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襄二十一年傳云：「會朝，禮之經也。」又《樂記》云：「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經」指的是禮之大法。⁵⁶換言之，「禮經」之為「周禮」，也就是周代之禮法，不見得是具體成文的原則規範，它的內容遠多於今日可見之《周禮》，而且《左傳》所載錄的禮法制度，內容也遠非《周禮》所可概括。

而劉文淇所謂專據「周禮」，也不是《周禮》一書。他引〈太宰〉「掌建邦六典」，《注》云：「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乘以制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視「禮經」為周典，不必定關乎周公創制。⁵⁷

因而劉文淇其考據「周禮」，或考《周禮》、《逸周書》所載，或錄先秦諸子所言，或取漢儒所考周制，可供根據的文獻材料很多。雖然參考文獻不少，卻不見得指向同一個方向，有一定的結論，特別是在禮制的考辨上，出現的問題當如《提要》評惠士奇《禮說》時所說：

鄭氏之時，去周已遠，故所注《周禮》，多比擬漢制以明之。今去漢末復閱千六百年，鄭氏所謂「猶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多不解為何語。……士奇此書，于古音、古字皆為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

⁵⁶ 參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54。

⁵⁷ 清·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隱七年《傳》「謂之禮經」條，頁 42。

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考鄭氏所引之漢制，以遞求周制，而各闡其制作之深意。⁵⁸

一方面，文字、名物、制度的隔閡，令周代禮文制度之內容艱澀難理。另一方面，《提要》意識到在《周禮》鄭玄注中，所考的周代之禮，當中不免雜入漢儒理解的周代之禮，以及漢人之禮。而漢人之說禮，單從三傳來看，就有諸多不同，因此欲在可考的文獻中，要找出周代禮文，以明周時制度儀文，有辨識上的困難，更不用說據此高度歧義性之制度儀文，做為評價《左傳》各家注疏，以及三傳優劣的標準是否可行了。因此以「周禮」做為解釋《春秋》和《左傳》的根據，清儒尋找釋經根據的理想範式，事實上卻存在許多困難和爭議。⁵⁹

劉文淇有意識分別今古文《春秋》觀，欲確立以「周禮」為據的釋經策略，然「周禮」內容無定，遑論關注「周禮」變遷，及魯史於「周禮」的因革損益。再者，他雖然理解到書法義例為史官成法不足以釋《春秋》，卻也沒有更可靠的資料作為建立釋例系統的根據，是以棄而不論，其新疏之釋經解傳，十之七、八仍據杜預經傳注釋，又可見杜預學之重要。因此，清儒廓除杜預《春秋》學說，逐步清理杜預在注釋、詮釋經傳上的缺失與不足，但在解經理論與實際釋經上，實難以排除杜預說。

特別是劉師培在早期治經，其實採以史文為根據釋經，以為《春秋》之作，不僅在史文上、也在史法上前有所承的立場。他在二十七歲著作的〈孔子作春秋說〉，指出「作」有二個意思，一是「創作」，始作的意思；一是「為」，指援古史以為《春秋》，具有承前以為之的意涵。他指出：

⁵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10。

⁵⁹ 學者整理《舊注疏證》禮制儀文的主張，多無法有確論。如《左傳》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鄭玄依《公羊》家說，主張天子親迎。《左傳》、《穀梁》及許慎則以天子不親迎。劉文淇贊同《左》、《穀》說，反對鄭玄說，卻又謂「《左氏》說又自異」，不能有所定論。參考曾聖益：《儀徵劉氏春秋左傳學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頁383）。

孟子言孔子作《春秋》，即言孔子因古史以為《春秋》也，故又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至於「《詩》亡，然後《春秋》作」，則「作」為始義，與所「作《春秋》」之「作」殊言。《春秋》所記之事始於東周也，況《春秋》為魯史舊文，非惟《左傳》著其說也。……《春秋》說有所因，三傳並持此說。⁶⁰

以孟子所說「作《春秋》」，具「因古史以為《春秋》」之義，與「《春秋》作」，具「始」義不同，而傾向《春秋》為魯史舊文、因古史之義，又批評「漢儒不信三傳，而專信緯書。」與二十八歲以後，信從漢儒經說的態度，有很大的差異。

杜預特別重視《春秋》據魯史而作的意涵，從而追溯魯史的體例的來源。他將「史」的性質帶入對《春秋》的理解當中，強調孔子傳承歷史文化的地位與貢獻，其實是站在漢儒《左傳》學的基礎上，反省其學，又進一步開發《春秋》經傳經史面向的價值，有其創發新思維的重要內涵與價值。劉師培雖然建立一套回歸漢儒的釋經系統，事實上也接受杜預以《春秋》取自魯史史法，損益周禮而成。然而劉師培雖具歷史變遷意識，卻回到以孔子當素王的漢儒立場，主張《春秋》乃孔子新構，將解釋《春秋》導向書法凡例的解讀中。他透過強調書法條例推崇《春秋》經傳作為「經」的恆常意義，卻失去《春秋》、《左傳》俱為史記這一層面的性質與內涵，與其理解《春秋》學的初衷與基本認知相違，遂無法透徹地掌握《春秋》因革損益的歷史特性，忽略漢儒釋經的侷限。在漢儒與杜預經說的衝突中，劉師培抉擇漢儒說作為詮釋《春秋》的主要根據，章太炎則在反省檢討漢儒問題後，重新推崇杜預《春秋》學說。

六、「古義無徵」：棄「漢學」從杜學

劉師培認為書法條例乃孔子損益周禮而成的改制之法，具有異於史記舊聞的恆常價值，將詮釋《春秋》的主要方式，導向漢儒的條例說經，相對的忽略《左

⁶⁰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左盒集》卷二，頁1213。

傳》的史文特質與價值。劉師培《左傳》學學承三世，素為章太炎欽服，兩人皆承乾嘉之學，具深厚的漢學根柢，於《左傳》的意見，多有會同。起初章太炎批評杜預否定孔子素王說，舉《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⁶¹以駁杜說，認為孔子為素王，名實相符，責杜預「夫子於此又何讓焉？而杜預以欺天擬之。」⁶²然而卻又主張：「獨謂孔子將修《春秋》，於丘明觀書周史，歸作經傳，共相表裏。」⁶³以周史在孔子修作《春秋》過程中，具相當的重要性，可見章太炎身上同時存在漢儒與杜預說的影響。

其後章太炎為尋求經說根本，層層上復，溯及秦、漢諸說，梳理《左傳》經說流脈後，看到漢儒家法師說間的分歧，使其崇漢的態度出現重大轉變。1903年，章太炎致書劉師培，始疑漢儒經訓，指出劉歆、許淑多言義例，說例大體相似，卻與鄭玄、服虔多言訓故的釋經方式，大不相同，至於賈逵說經，兼言義例、訓故，又多申己義者。章太炎觀察到東漢儒者不同的釋經方式，主張當對東漢諸說重新檢視，深入分別，在「古義無徵，而新說未鑿」的情況，應跳脫家法，先以己意衡度之，不當完全採信漢儒經說。⁶⁴

他發現漢代《左傳》學者多引用《公羊》說，乃為達推廣之效，非學術相通所致，因此轉向對漢儒《左傳》學有所保留，對杜預的態度，反由疑轉信，認為杜預疑漢儒詭變師法並非誣指，而對杜預專以《左傳》五十凡例釋經，排除東漢諸儒援引二傳以說經的方式，大為稱許。⁶⁵在悟得漢代《左傳》學流變關鍵後，章

⁶¹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章太炎全集》二，頁60。

⁶² 同前註。

⁶³ 章太炎：〈與譚獻〉（1896），《章太炎書信集》，頁1。

⁶⁴ 章氏致書劉師培謂：「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劉、許諸家，多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義例，其訓故又多乖異，侍中兼之，亦申己義。治經者既貴其通，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侍中之言蔽仲師。家有異義，不容唯阿兩可。至夫古義無徵，而新說未鑿者，無妨于疏中特下己意，乃不為家法所困。」章太炎：〈與劉師培〉（1903），《章太炎書信集》，（氏撰，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72、73。

⁶⁵ 章太炎晚年自述：「僕治此經，近四十年，始雖知《公羊》之妄，乃于《左氏》大義，猶宗

太炎後來接受杜預反對素王改制的說法，指出：

自厲王流彘，天子失官，宣王中興，必多損益，其後桓、文迭伯，事與古殊。《傳》所稱「禮」，自是時王新令爾。⁶⁶

認為《左傳》之述禮，出於損益前代之時王新令。此番見解實與杜預說同出一轍。接著又指出「然素王改制，彼《傳》無明文，特仲舒輩傳會成之。」就傳文未見素王改制說，以改制說當為董仲舒及今文家增益。

章太炎認為隱在改制說背後，實際上是《春秋》、《左傳》隨時損益之文，而非孔子特意改述。他舉例說明《左傳》損益時令之況。如《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然據〈大宗伯〉，祠、禴、嘗、烝為四時享，〈小雅〉亦云「禴、祠、烝、嘗」。經傳皆無祠、禴，疑為素王新制。章太炎援引〈楚語〉觀射父論祀牲，有烝嘗，無祠禴。《說文》謂祠「品物少，多文辭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易》言「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可見禴無祭牲。他認為，春、夏萬寶未成，其禮為殺，故史官舊例不書祠禴，不可視之為「素王新制」。又指出，關於侯國郊祀，獨魯有之，乃周太史獨頒於魯，不通他國者，此即魯惠公請郊廟之禮，周天子使史角往之事。⁶⁷通過考禮，明其禮意，章太炎以《春秋》、《左傳》之記禮，與其他典籍有異之因，乃出於禮之損益，或是基於魯特殊國情，皆不從孔子改制新法的角度釋經。

漢儒普遍接受素王改制說，東漢賈、服的《左傳》學也不例外，因此漢儒解釋書法義例，形成一套以素王改制說為中心的詮釋系統。章太炎既反對素王改制說，也駁斥以此觀點所形成的經義解釋。如《春秋》經於諸侯之始，皆書「元年」。漢儒特別重視《春秋》在君王即位之初，書「元年春王正月」的意義。何

劉、賈。後在日本東京，燕閑無事，仰屋以思，乃悟劉、賈諸公，欲通其道，猶多附會《公羊》，心甚少之。亟尋杜氏《釋例》，文直辭質，以為六代以來，重杜氏而屏劉、賈，蓋亦有因。」章太炎：〈與吳承仕〉，同前，頁361。

⁶⁶ 同註65，下引同，頁265。

⁶⁷ 同前註，頁265、266。

休以其有五始之義，以元爲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指文王，乃周受命之始；正月表政教之始；公即位表示一國之始。劉歆亦謂「元者，善之長」，「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章太炎卻指出，書「元年」，如《尚書》。《尚書·伊訓》有「太甲元年」，固有以元年建首者，不特《春秋》獨有，而以「元年」爲人君嗣服之常稱，無義可說，認爲何、劉二家皆傳會之說。⁶⁸

其次，章太炎認爲，杜預優於漢儒經說最主要特點，在於據《傳》說經。他主張釋《經》、《傳》當貫徹杜預之言「經之條貫，必出於傳」、「《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六也，固當依《傳》以爲斷」⁶⁹的詮釋原則，以凡例釋書法，視書法有褒貶，不是唯一憑藉，詮釋書法仍須依《傳》文爲斷。如隱公十一年，隱公崩亡，經文不書「葬隱公」。賈逵主張，不書「葬」是因爲未討殺隱公之賊，故經文不書。杜預則認爲因桓公弑隱篡位，所以喪禮不成，喪禮不成，所以不書「葬」。傳文言不書「葬」，乃因「不成喪」，又述其不成葬之因。概言之，賈逵認爲經文不書，是孔子有所措意者；杜預則據「不成喪」之史實以成說。由此可知，杜預是專據傳文解釋傳文、經文書法，賈、服則不全透過解釋《傳》文來闡釋經義。

他提出，《經》、《傳》一體，書法出於《經》，《傳》文凡例之釋書法，僅是史官記事體例的呈現。就同一事件而言，透過《傳》文委曲事狀，明其義法。就相同書法的不同事件而言，則隨事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義法微旨，皆不能單就書法凡例定褒貶，是以他說：「大抵《左氏》以事托義，故說經之處，鮮下己意，而多借他處之義以釋之，故其義最爲難知，而其功亦如集腋穀材，非二百四十年之遺語，不足以回旋其意也。」⁷⁰視《左傳》大篇幅的史事述評爲解釋《春秋》、孔子意旨的基礎根據，相當重視《春秋》經之爲「史」的意義與價值，也特別突出《左傳》史記論文的重要性。因此，透過《經》、《傳》一體、對照《經》、

⁶⁸ 同前註，頁 267、268。

⁶⁹ 晉·杜預：《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序》，頁 15。

⁷⁰ 章太炎：《今古文辨義》，《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頁 31。

《傳》，《春秋》不僅是官史，也承載著周禮與東周損益後的禮文；《左傳》亦不僅是記述史記論文，成為映見孔子義法、經世意旨的典籍。

章太炎早期推崇漢學批評杜預學，在晚期則一反清儒排杜的立場，反省漢代《左傳》學的流變與解經方式，剝除因漢儒素王改制說而來的解經方法與觀念制約，採取杜預學的觀點，重新確立專據《左傳》解釋《春秋》與書法的解經方式，說明《春秋》、《左傳》互文成義、著事以明義的特點，較之劉氏家族以籠統、不確定之「周禮」與漢儒義例詮釋《春秋》，更能確其所據、明其所指。

七、結語

近年學者多關注從漢學角度觀照清代《左傳》學的發展與內涵，本文自清代《左傳》學內部問題切入，從《春秋》學解經理論、觀念與方法，說明清代學者在漢儒與杜預學中的折衝與抉擇。他們由主以孔子《春秋》學、遵從杜預據史釋經、據傳釋經之法與《春秋》學主張，至抉發周秦古經古傳、漢儒經注傳釋，以及今文學《春秋》學主張、古文學《春秋》主張，積極建立以漢儒《春秋》與解經方法為範式的詮釋理論與方法，以取代乾嘉以來飽受批評的杜預學，在晚清卻儼然形成漢儒學與杜預學兩種《左傳》學研究方向，當中又以後者最能銜接現代經史思想，其歷程與結論，試理如下：

- 一、清初學者研究《春秋》主以《左傳》，做為信而有徵之據，在解經理論與方法上，多繼承杜預學。他們雖不積極反對素王改制說，但認為孔子《春秋》多承自魯史、當中寓有史官書法與周禮儀則，認同杜預學以《春秋》寓具史的性質、史書條例與周禮書法。在方法上，他們多以史官直書、闕文無例，當中並無深意解釋經文，並不同意宋明以來多主《公羊》、《穀梁》學以條例說經的方式詮釋經義，認為當中沒有一致的標準做為詮釋根據，不可盡信。
- 二、乾嘉中期，杜預注不斷被補正與批評的同時，清儒也逐漸建立漢儒經傳注釋的系統概貌。在解經理論上，劉文淇等不接受西漢《公羊》學以《春秋》為改制之文、從殷之質的說法，更清楚的將《春秋》學定位在東漢《左傳》學的考索上，除古訓研究、禮制考索、名物度數上整理漢儒經說，重覓賈逵《春

秋序》說，以魯承周禮，孔子立素王之法。所謂立素王之法，在漢代今古文學是一種基礎主張與共識，有從殷與從周內容上的不同。東漢《左傳》學者是否明確的專從周禮，有待查考，但清代《左傳》學者明確的主張孔子《春秋》之據，是由文王、武王、周公而來的周文傳統，這樣的歷史傳承思想，不能說沒有杜預的影響在其中。

三、在解經方法上，劉文淇不同意三傳說例，也不信漢儒說例，其實可以說對漢儒解經抱有懷疑；但在劉師培，為抗衡當時今文學家主以西漢《公羊》學，透過弱化《春秋》承自魯史周文這一層意義，強調《春秋》為孔子新構，企圖建立以東漢《左傳》學以條例釋經的解經系統。劉氏家族深研東漢《左傳》學，在重整經解古說、建構《春秋》學觀與具體解經方法後，似乎形成一組漢儒解經的系統架構，但是他們在解經方法上的分歧，又可見其依違於漢儒、杜說經史觀念時的游移與紛亂。

四、杜預學不同漢儒《春秋》學的最大特點在於史學意識的增強，主張孔子在前代學術成績上，續以深化、積累，方得成就《春秋》。總體而言，清儒對杜預學之接受可分為二個層面，一方面接受其《春秋》出乎魯史、據乎周禮的《春秋》學理論與觀念，一方面在有所本的徵實要求下，認同杜預學說必從史，言必據傳的釋經方式，經過對漢儒經說的追尋與反省，這樣的觀念、理論與方法，確立於章太炎。因為接受杜預以來的經史思維，不同於漢代之尊《春秋》為立法改制之萬世經典，清儒有識於《春秋》經世與義理的價值基礎承自周代禮文，重視歷史傳承這一層面的意義，經此思想轉折，使《春秋》、乃至於六經典籍得以上溯周禮，接續對三代六藝之學的深究，從學術史層面來看，對晚清民國經史思想的啟蒙與發展有其重要意義。^⑦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清道光九年（1829）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庚申十年

^⑦ 本文經三位匿名審查教授悉心指教，提供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論文猶有不足，尚祈見教。

(1860) 補刻《皇清經解》本。

——：《經問》，清道光九年（1829）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庚申十年（1860）補刻《皇清經解》本。

清·惠棟，《左傳補註》，清道光九年（1829）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庚申十年（1860）補刻《皇清經解》本

——，《松崖文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影《聚學軒叢書》本。

——，《九經古義》，清道光九年（1829）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庚申十年（1860）補刻《皇清經解》本。

清·焦循，《春秋左傳補註》，清道光九年（1829）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庚申十年（1860）補刻《皇清經解》本。

清·臧壽恭，《春秋左氏古義》，《皇清經解續編》，清光緒十四年（1888）南菁書院刊本。

清·李貽德撰，《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皇清經解續編》，清光緒十四年（1888）南菁書院刊本。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

清·萬斯同，《群書疑辨》，臺北：廣文書局，1972 年。

清·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

晉·杜預，《春秋釋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

宋·歐陽修、宋祁，《新校本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唐·魏徵，《新校本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後晉·劉昫，《新校本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清·顧炎武著，華忱之點校：《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漢·班固，《新校本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

清·劉毓崧著、劉承幹校，《通義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臺北市：新文豐，1989 年。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清·姚際恆，《春秋通論》，《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清·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清·永瑤、紀昀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年。

清·戴震著、楊應芹編，《戴東原文集·增編》，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

清·鄭梁，《寒村詩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二、近人著作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年。

徐世昌，《清儒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79 年。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 年。

程元敏，《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

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李妙根編，《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年。

黃翠芬，《章太炎春秋左傳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年。

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

張惠貞，《劉文淇春秋左傳舊注疏證體例之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羅軍鳳，《清代春秋左傳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宋惠如，《劉師培春秋左傳學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

——，《晚清民初經學思想的轉變——以章太炎「春秋左傳學」為中心》，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 年。

三、論文期刊

陳慶煌，〈論左龔對於春秋左氏學之貢獻〉，《孔孟月刊》53 期，1987 年 4 月。

張廣慶，〈劉申叔《春秋左氏傳》申漢難杜說〉，《中國書目月刊》第 22 卷第 2

- 期，1988 年 9 月。
- 林慶彰，〈萬斯大的春秋學〉，《清史研究》2 期，1994 年 6 月。
- 劉家和，〈從清儒的臧否中看《左傳》杜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5 期。
- 古偉瀛，〈顧炎武對「春秋」及「左傳」的詮釋〉，《臺大歷史學報》第 28 期，2001 年 12 月。DOI：10.6253/ntuhistory.2001.28.04
- 謝明憲，〈「杜注補正」與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東方人文學誌》第 2 卷第 1 期，2003 年 3 月。
- 徐興無，〈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讀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注例〉〉，《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
- 蔡妙真，〈顧炎武「日知錄」中之「左傳」學〉，《興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6 年 6 月。
- 張素卿，〈劉師培《左傳》學的傳承與嬗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2007 年 11 月。
- ，〈詮釋與辨疑——章太炎《春秋左氏疑義問答》略論〉，《經學研究集刊》第 6 期，2009 年 5 月。
- 羅軍鳳，〈從杜注的遭遇看乾嘉漢學的學術規範〉，《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 年 4 期。
- ，〈清儒眼中杜預義理的「悖謬」〉，《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 2 期。
- ，〈治經方法的嬗變與清代《春秋左傳》學的發展〉，《重慶社會科學》2009 年 3 期。
- ，〈乾嘉漢學視野中的杜注〉，《漢學研究》27 卷 3 期，2009 年。
- ，〈清代《春秋左傳》學的目標、發展與各階段的主要課題〉，《漢學研究通訊》總 116 期，2010 年 11 月。
- 金永健，〈論顧炎武的春秋經傳研究〉，《學習與探索》，2009 年第 2 期。
- 張高評，〈「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述評——論劉逢祿《左氏》不傳《春秋》」說〉，《經學研究集刊》第 6 期，2009 年 5 月。

黃梓勇，〈章太炎早年的春秋左傳學與清代公羊學的關係——以春秋左傳讀爲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5 期，2009 年 9 月。

錢慧真，〈惠棟的春秋學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 年 12 月第 4 期。

四、學位論文

陳逢源，《毛西河及其《春秋》學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0 年。

蕭淑惠，《清儒規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 年。

蔡孝懌，《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8 年。

陳志修，《儀徵劉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0 年。

曾聖益，《儀徵劉氏春秋左傳學研究》，臺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

魏千鈞，《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康凱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研究》，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郭院林，《「以禮治左」到「援古經世」清代儀徵劉氏左傳家學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年。

劉宗棠，《清代左傳文獻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8 年。

金永健，《清代左傳考證研究》，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9 年。

The Influence of Du Yu's Studies in the Zouzhuan Studies of Qing Dynasty

Sung, Hui-J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Zouzhuan Studies of Qing Dynasty built on evidence-based academic atmosphere, so they applie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Du Yu's study in early age. Although in the latter of Qing Dynasty, Scholars criticized Du Yu and researched the H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study to base on, but they're still in Du Yu's influence. It makes Qing Dynasty's Classic study different from the Han Dynasty's. Therefore, scholars reconstructed the Zouzhuan Studies and pondered deeply the meaning of classical studies. The re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of modern thought.

Keywords: Studies of Zouzhuan, view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Du Yu